

穆旦

穆旦

诗歌的

历史
修
辞

吴向廷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穆旦 诗歌的

历史
修
辞

吴向廷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旦诗歌的历史修辞 / 吴向廷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075-4666-8

I. ①穆… II. ①吴… III. ①穆旦(1918-1977) - 诗歌研究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8669号

穆旦诗歌的历史修辞

责任编辑: 杨艳丽 张超琪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电话: 发行部 010-58336238 编辑部 010-5833619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29千字

版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075-4666-8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穆旦之前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意识	17
第一节 中国新诗的“草创阶段”:几个例子	18
第二节 三、四十年代之交的诗坛状况	56
第三节 战争中诗歌的分歧	73
第二章 诗歌与革命:论穆旦诗歌的国际背景	104
第一节 穆旦与艾略特	106
第二节 穆旦与奥登	131
第三节 现代诗歌的两个潮流	153
第三章 战争、史诗与历史修辞	179
第一节 历史意识(一):时间	180
第二节 历史意识(二):空间	200
第三节 战争与现代史诗	224
第四章 历史修辞:诗人及其时代	246
第一节 诗与散文	247
第二节 晦涩的历史内涵	267
第三节 现代诗人与“城邦”	278

结 语 305

参考书目 307

导 论

一、历史修辞：一种描述穆旦诗歌的方式

穆旦诗歌的独特性是这本书研究的中心。定义和描述这种特殊性,其内在依据在于研究对象,即穆旦诗歌本身的性质。简言之,穆旦诗歌的独特性在于两点:其一,在内容上,较之前辈和同辈新诗人,穆旦更好地处理了战争和革命的主题,同时通过对历史和时代经验的探讨,他的诗歌能够很好地保存诗人对于特定时代的政治和伦理思考。他的诗歌具有一种时代的特殊性,又因为这种特殊性具有了历史的普遍性;其二,在形式上,穆旦坚定地拒绝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传统,同时与西方诗歌潮流中的左翼现代诗歌遥相呼应。这一潮流以奥登等人为代表,继承了艾略特等人所发扬光大的现代诗歌的技艺,追求诗歌的包容性和复杂性。

于是,我们把穆旦诗歌的“历史性”和“修辞性”结合起来,提出穆旦诗歌的“历史修辞”这一概念,意在准确地把握穆旦诗歌的独特性。“历史修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整体性正是理解穆旦诗歌的关键。其意义在于:第一,穆旦诗歌的写作对象是具有特定历史哲学色彩的时代经验,这种经验是一种历史的眼光观照下的独特现实,也是广阔空间中的局部经验,因而是充分的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在表现这种具有现代色彩的经验现实的过程中,现代诗歌的语言艺术成为了必须的选择,从波德莱尔到艾略特,这种语言是古典和浪漫的辩证统一,追求在短短的诗行中既包含世俗世界,也再

现人间天堂,实现有限与无限、特殊与普遍、短暂和永恒的统一。现代诗歌的复杂、晦涩和朦胧正是这一写作抱负的美学概括。第二,现代诗歌的形式技巧也同时是一种历史现象,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性。在奥登和穆旦的写作生涯中,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诗人不再拥有古典主义的规范和秩序,也不再拥有浪漫主义的自我和情感,他们表达的是失去家园的历史窘境。现代的诗歌语言是对这一现代性处境的形式再现,因而这种修辞成为了这一历史独特性的内在体现。穆旦诗歌的历史修辞的意义因而是指,诗歌的主题意味着诗歌的修辞,诗歌的修辞也意味着诗歌的主题。

这里所涉及的“历史”,不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所划定的作品产生的具体时代状况(包括作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情况,这种研究常常与所谓的文学社会学的方法等同起来)。它既指发生在穆旦身边的同时代的具体环境,如他的求学、流亡、工作、参军和留学等的经历,也指作为奥登团体的同代人的穆旦所生存的普遍的“世界历史”,近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更远的则是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中的独特阶段。在具体的抒情诗的写作上,穆旦所面临的则不仅是国内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传统,还包括西方现代诗歌传统及其所处理的欧洲遗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捕捉到穆旦诗歌的历史性的特征,并且给予其以恰当的评价。更进一步的,历史是那些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更不能选择的规定性,就如小说这种形式无法逃避它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宿命一样。一方面,穆旦所处理的历史是普遍历史视野中的一个独特的时代,对于这一特定时代的卓越探索使穆旦区别于同时代及其前辈和后辈诗人;另一方面,穆旦的创作同时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它不是任何一个其他时代的产物,它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视野中才能理解。作为文本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文本辩证地统一,对一个方面的理解必定意味着对于另一个方面的理解。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对于穆旦诗歌的理解就会出现重要的偏差。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譬如,在对于《诗八首》的解读中,诗歌史的方式是无效的,因为这首诗缺乏足够的历史档案的支撑,无法在“个人爱情”和历史之间建立关联,诗歌的阐释因此迅速滑落进入对于诗歌主题的一个简单化的处理之中。然而实际上,如果对于穆旦诗歌的历史性有一个总体的了解,能够将爱情主题定位于一种普遍的时代状况之中,那么这首诗所焕发出的历史意义就是异常饱满和精彩的。

这里所说的“修辞”，作为历史的呈现方式，同时又受到历史的限定。在文学作品中，作为内容的历史本身无法直接呈现，它必须通过修辞才能实现自己。这种情形正如古希腊的神话故事需要通过史诗、抒情诗和戏剧来实现，而基督教则需要通过《圣经》来实现一样。这种修辞的具体选择不是任意的和自由的，即使在天才那里，他也要受到历史本身的限定，从而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创造性地使用修辞。在荷马那里，为了向观众讲述一个全知的世界和故事，荷马选择了特定的修辞，德国罗曼语学者奥尔巴赫总结道：“各个事件的环节之间联系得十分清楚；使用大量连词、副词、小品词和其他句法修辞手段意义明确、层次分明地将人、物和事件区分开来，同时又将它们置于一种不间断而通畅的联系之中；如同各个事件本身一样，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们在时间、地点、原因、目的、结果、比较、让步、对照以及条件的规定上都表达得十分完备。这样一来，所有事件都不会留下断简残篇或不明不白的表达方式，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疏漏和裂缝，不会有可以继续深究的地方。”^①正是由于为了展现神意关注下的无微不至的历史进程，荷马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史诗修辞。现代诗歌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对于诗人而言，采用何种修辞是有效的，其意义的重要性不亚于表现怎样的诗歌主题。在穆旦与他的同代人卞之琳和冯至之间，这种差异是极端重要的；相对而言，修辞的差异在穆旦和他所赞许的艾青之间则并不巨大。如果在世界诗歌的范围内进行观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的分歧所暴露的问题同样出现在欧洲。奥登一代批判地继承了从叶芝、庞德直到艾略特的诗歌修辞，但偏离了他们所探索的主题；同时在奥登一代与欧陆的超现实主义诗人之间，尽管面对着相似的历史处境，他们却采取了迥异的历史修辞。

“历史”和“修辞”之间的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穆旦的创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这种内在关联的认识，取决于对于二者关系中的必然性的部分的认识。这种必然性不仅可以揭示出穆旦的写作如何区别于他之前的新诗写作，还可以揭示出这种变革性的写作意义何在；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它还可以解释穆旦的写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诗人去世之间所发生的变化。在总体历史的视野上看，穆旦的写作是现代诗歌的一个经典路线，它所

^①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展现的命运也是这一独特路线的普遍命运。穆旦贯穿一生的写作,可以在狭义的个人写作的意义上来理解,但更应该同时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修辞来理解。这两种理解方式是迥然不同的,其原因不仅在于后者能够提供更多的深度和广度,更在于它与穆旦写作的诗歌意识相一致。穆旦从来都反对纯粹个人意义的诗歌写作,而试图展现一个独特时代的特殊感受。“个人的意义”从属于这个“个人”所存在的历史的意义。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具有无处不在的优先性。因而,传记性的研究对于穆旦的创作而言,只能作为一个研究的起点而存在。除了基本的学术价值之外,传记研究时常所诱导的,通过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变化来理解同时期的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可能的误解,需要加以警惕。德国学者吕森谈道:“历史意识是将时间经验通过回忆转化为生活实践导向的精神(包括情感和认知的、审美的、道德的、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活动的总和。”^①穆旦写作的这种独特性正是源于他的独特的历史哲学。穆旦的历史意识内在地反对个人的诗歌写作史,反对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理解他的作品。然而,即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穆旦研究中,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理解穆旦作品的思路却仍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二、穆旦与新诗草创时期的结束

抗战的爆发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战争所带来的不仅是直接的物质和生命的损失、文明的灾难和创伤以及国家的和个人的形形色色的悲剧,它还带来了新的时代感觉和历史意识。新诗的变化体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内在意义,正是因为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新诗人对新诗所积累的成果的批判性反思成为可能。

从新文化运动直到抗战爆发,中国诗歌的版图虽然不再是古典文言的天下,但白话诗歌的合法性却并未确立。这期间的新诗面貌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形态,不同的诗人从古今中西的不同资源里汲取营养,又创作出不尽相同的诗歌作品。如果给从胡适到穆旦的诗歌历史进行一次理论性的总

^① 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蔡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3页。

结,不妨称之为新诗的“草创时期”,这个时期现代诗歌的视野被它自身的语言和形式问题所约束。语言和形式问题的处理,涉及的不仅是白话语言的内部问题,也是如何处理现代诗歌、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关系问题。譬如,梁实秋发起的关于诗歌的晦涩问题,新月派集中探讨的关于格律的问题,胡适与废名之间的关于新诗史叙述的问题,其背后的诉求都与从新诗的形式问题出发,为现代诗歌寻求合法性息息相关。在穆旦之前,新诗发展的主要成就仍然在现代语言自我塑造、更新和形成的范围之内,即“语言实验”的阶段。这时候的现代诗歌更加关注现代白话语言自身的表现性(如意象、主题、意境等)、形式性(如韵律等)以及处理与古典文言诗歌的关系问题上。这个阶段是短暂却又复杂的,中国的古典文学、民间的方言歌谣、外国的整个文学乃至文化传统都为现代诗歌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比如在胡适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中,美国意象派诗歌、宋诗、晚清的诗界革命、白话文学语言的历史、实验主义哲学思潮等资源都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郭沫若那里,诗经、楚辞、庄子、唐诗、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乃至日本的俳句构成了他个人的诗歌传统和谱系。从对于现代诗歌语言的创制上讲,这一时期他们的探索和成就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从另外历史意识和能力的角度上讲,他们的努力又是有局限的。面对历史时,胡适的学术史、思想史著作、评论和日记,郭沫若的戏剧、批评和历史著作成为了他们更好的选择。从他们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上讲,诗歌的语言显然不能胜任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或者说,诗歌的语言在他们那里并没有获得它的历史意识。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批评上,这些诗歌都是在古今中西碰撞中逐渐摸索,寻找自己的独特性。在激烈动荡的现代中国,诗歌语言在大部分时候仍然只是实验室里的产品,专注于形式探索的诗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获得对复杂的历史现实足够的表现能力。面对不断到来的时代对于诗人理智和情感、语言和思想的考验,很多诗人放弃了这种艰苦的艺术探索。那些希冀对现实和历史做出回答和反应的人中,有些选择了实际的政治运动,有些则选择了其他的文体形式,诗歌语言等待注入新的力量。

在“草创时期”的普遍追求之中,每一个诗人的探索又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草创时期”的诗歌写作由于其内在形态各异的形式探索,因而不能够为其找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历史叙述。确

切地说,一般叙述中的“历史”和“传统”的字样还没有进入此时的现代诗歌。同时,由于对新诗的性质、动力和时代内涵的认识的局限,这个时期大多数人的诗歌探索是短暂的,很难从中找到某一个诗人严肃、持久和纯粹地保持对诗歌写作的追求。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个人写作的具体问题,不如说是时代和历史对于新诗写作做出了“有限”的规定。理解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对比唐诗及其以后的古典诗歌写作由于具备了完整的政治或美学的功能之后对于古代文人的意义。现代诗歌的形式探索一旦到达一定的阶段,“草创时期”那些曾经作为动力的因素就反过来成为了约束,不断损耗着新诗的可能性,绝大多数诗人所遇到的困境某种意义上都是这一整体性困境的个别表达。与此同时,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和民族危亡的悲剧性考验,内在地需要新的、更有力的诗歌语言的出现。现代诗歌的合法性存在不再是处理其内部的形式问题,也不是处理与诸种资源关系的问题,而是处理迫切性的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即使此时的诗歌语言仍然有丰富的自我探索的余地,但是它必须从每一个诗人的“语言实验室”中挣脱出来,接受这次统一历史的考验。

从这个问题出发返回现代诗歌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穆旦(查良铮)的工作是标志性的。其一,在历史的脉络上,穆旦诗歌产生于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产生于颠沛流离、多灾多难的抗日战争之中;在诗学的脉络上,中国现代诗歌被迫结束其着力于形式探索的“草创时期”,进入历史和现实对诗歌语言的严峻考验的阶段,新的诗歌必须对历史进行有效的处理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其二,同时期的英美现代诗歌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艾略特、奥登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对于穆旦诗歌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借鉴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考察英美现代诗歌如何处理历史、现实和传统的经验以及其对于穆旦的影响,可以有效地揭示穆旦诗歌的历史独特性。

三、新诗史与新诗的历史性问题

如果我们将执著于狭义的语言和形式探索的现代诗歌称为新诗的“草创时期”,那么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现代诗歌“草创时期”的终结产生了一

个需要进一步回顾和反思的问题。如果说战争重新发明了诗歌和时代的关系,那么在此之前的时期,诗歌和时代的关系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一个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讲,“草创时期”的现代诗歌在这方面显然没有取得瞩目的成果。于是,讨论“草创时期”的诗歌的历史意义并不是讨论诗歌和时代的关系,而往往是一个讨论诗歌和自己的“传统”的关系问题。于是,我们可能面临一个初看起来略显奇怪的问题,即,战争爆发前的新诗史是“反历史”的,即反对在诗歌和历史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一个更为诡辩的叙述是,“草创阶段”的新诗以“反历史”的方式与历史建立关系,尽管这样的叙述对于更深层次问题的揭示并无助益。)此时,新诗史作为文学史的分支,而文学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其意在整理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然而这种历史脉络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了。或者说,新诗史不再表现为一个前后连贯的、不断进步的发展,而是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混乱过程”。新诗史成为了“不可能”,或者是一个对于新诗“无效”的处理方式。

从与历史的关系上讲,穆旦的诗歌可以被视作一次新诗的自我挽救,这种挽救同时是对文学史和新诗史的挽救。韦勒克在其经典著作《文学理论》中谈道:“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该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①无论文学史是一种社会史还是思想史,其前提本身在于文学可以与社会和思想的历史发生直接的关系。正是从这种关系出发,文学史得以有效地介入历史的过程之中,文学的历史过程变成了一种历史知识。“如果文学史并不单单描述作品所反映的一般历史过程的话,而且,当它在‘文学演进’的过程中发现了真正属于文学的社会造型功能——因为文学与其他艺术和社会力量在把人类从自然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活动中进行竞赛——的时候,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鸿沟和美学知识与历史知识之间的鸿沟就可以被沟通了。”^②在最理想的时候,文学史就成为了“普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1页。

② 姚斯:《文学史向文论的挑战》,收入《20世纪西方文论选·读者系统》(张首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遍历史”的一种表现形式。德国学者古姆布莱希特指出：“一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才开始将历史重建和反思的范围进行分门别类。那时，所谓‘文学史’指的是通过这种分门别类而可能（或必然）产生的一种话语，其探讨的中心问题就是文学现象的内容或形式表现的阶段序列；然而在这一领域内，始终是‘普遍的历史过程’的在场，由于这种在场，致使‘文学史’与‘历史’的关系不能成其为问题，而且也无法去设想一个‘独立文学史的演变’。”^①

在一部分文学史著作中，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被等同于对文学所产生的时代的相关情况的机械描述，又进而被缩减为一种关于文学的档案性的考证。于是，文学的历史性经由文学史的处理，成了对文学的实证研究。新诗史（自然也是文学史）的这个研究思路导致了一系列新诗研究中实证方法对于揭示其历史内涵上的失败。事实上，文学的历史不等于历史的文学。在中国强有力的史学传统之中，历史知识一直为文学提供了切实的、客观的，也最终是高超的理解的可能性。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人之作品，考订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②这种优异的史家路数可以对比法国实证主义文学史家朗松的说法：“文学史固有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从我们出发，按我们的思想口味去判断作品，而是要从中发现作者想要放进作品中去的是什么，作品最初那批读者从中得到的又是什么，作品是怎样存在于后来的几代人的头脑和心灵里，又是怎样在其中起作用。文学史家能把现在和过去分离，主观与史实相分离这项工作做好就够了。这项工作，除了对作品进行阅读和剖析以外，还要围绕作品做大量的研究，利用各种资料和史实，使一部书的真实个性和历史作用得到阐明，从而使这部书不和我们纠缠在一起，但它和我们的内心感受分开——单单阅读时常会把两者混杂在一起的。”^③二者的共同点都在于，他们把文学史的任务诉诸文学和它自己的时代建立

① 汉·乌·古姆布莱希特：《文学史——消失的总体性的片段》，载于《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②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③ 朗松著，昂利·拜尔编：《方法、批评及文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联系,并且力求免于后代研究者的主观之见。归根到底,这种研究总体上属于文学的实证历史的研究,而文学史在这时候与文学的现代性发生了矛盾。

在美国学者保罗·德·曼的名文《文学史与文学的现代性》中,德·曼说道:

如下的事实是被广泛承认的,文学的实证的历史把文学当作经验的集合,仅仅是文学非其所是的历史。在最好的意义上,它的基础性的分类工作为真正的文学研究开辟了道路,而在最坏的意义上,它是真正理解文学的阻碍。在另一方面,文学的内在解释则宣称是反历史或非历史的,但它往往预设了一种批评家没有意识到的历史的观念。^①

一方面,文学的实证性研究并不是对于文学的实质性理解;另一方面,这种实证性研究所构成的历史更不是文学的历史。更加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性的文学本身是以反历史为前提,它不断地通过反对自己来定义自己。(波德里亚说:“诗歌是语言反抗自身法则的起义。”)德·曼最后说道:“为了成为好的文学史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经常所说的文学史与文学之间很少有关或完全无关,而我们所说的文学解释——是指那些优异的解释——是真正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让这一概念不限于文学,那么它就会让我们确信,历史知识的基础不是经验事实而不是已经写出的文本,即使这些文本在战争和革命中伪装了自己。”^②从某个角度讲,任何一种优异的解释,都包含着其深邃的历史性。这一点我们只需回顾波德莱尔对于爱伦·坡的解释或者艾略特对于玄学派的解释就可以看出来。在这些解释里,那些档案性的文学资料没有成为支撑性的论据,甚至几乎不出现,文学的历史性蕴藏于自身的法则之中。

政治哲人列奥·施特劳斯批评说:“政治哲学从根本上不同于政治哲学

① De Man, Paul, *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Modernity.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163.

② De Man, Paul, *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Modernity.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165.

自身的历史。有关政治事务之本性的问题及其解答,绝不会被错误地认为是如下问题:这个或那个哲人或所有哲人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完全独立于历史……但是,无论历史知识对政治哲学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它也只是政治哲学的预备与辅助,它不可能成为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①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新诗史的问题不仅在于它并不对诗歌本身做出评判(至少是某种具有深度的评判),而且它的存在恰恰是以这种评判的缺席为前提的。新诗史所提供的描述性的知识对于真正的理解诗歌是不够的,同时在某些关键问题的解答上,新诗史构成了理解上的障碍。新诗史的哲学意味近似于施特劳斯所反对的“历史主义”,本雅明也讲道:“历史主义心满意足地在历史的不同阶级之间确立因果联系。但没有一桩事实因其自身而具备历史性。它只在事后数千年中通过一系列与其毫不相干的事件而获得历史性。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该不会像提到一串念珠似的谈什么一系列事件了。它会转而把握一个历史的星座。这个星座是他自己的时代与一个确定的过去时代一道形成的。这样,他就建立了一个‘当下’的现在概念。这个概念贯穿于整个救世主时代的种种微小事物之中。”^②施特劳斯对于历史主义的批评对于新诗研究的意义在于,新诗史在揭示新诗的历史意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其原因在于新诗史的连续叙述中隐藏的以因果联系为纽带的时间并不对应着历史意义本身。也就是说,历史意义的揭示不能在一个历史主义的时间链条上完成,而是在一个不断构成的历史总体的时间碎片中才能实现。可以试想,对于穆旦诗歌历史意义的发现,总是意味着研究者对于总体历史视野的观察,而不是局限于对于穆旦创作时代的琐碎理解。

上述观点也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有力量把众人皆知的东西改铸成闻所未闻的东西,把普遍的东西如此简单而又深刻地宣告出来,以至于人们在深刻之上忽视简单,在简单之上忽视深刻……过去的箴言永远是一个神谕:唯有作为未来的建筑师,作为当代的智者,你们才会

①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历史》,收入《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② 本雅明著,汉娜·阿伦特编:《历史哲学论纲》,收入《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6页。

理解这神谕……现在应当知道,唯有建设未来的人才有权力裁判过去。”^①对于研究对象而言,采取不同的历史视野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而言,放置在“40年代”的认识框架中来理解和在整体的新诗史视野中来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无论是“20年代”“30年代”还是“40年代”,如果不仅是在表述上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文学史范畴,那么这些范畴在运用之前必须得到彻底的批判。“40年代”作为一个范畴是否成立,其历史哲学的基础不在于40年代本身,而在于它在总体历史中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解决40年代与总体历史的关系,那么40年代的存在就是不成立的。譬如,对于中国现代诗歌而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发生在抗战的爆发,并在三四十年代之交对诗歌写作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然而对于这一转折的历史意义的认识,如果不深入之前二十多年的诗歌意识,就不能得到有力的揭示。再如,存在于“40年代”不仅是客观意义上的公历时间,更是多种意义的历史时间。对于西南联大、延安、沦陷区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而言,“40年代”并不意味着不同地方所面临的处境和历史问题是一致的,譬如40年代初延安文艺界的历史视野就不同于西南联大的批判知识分子。同时,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4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的战争就是不同意义上的战争。对于诗歌创作的变化而言,“40年代”的范畴显然不能胜任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的描述。

四、一个研究史的回顾

相比其他的中国现代诗人而言,穆旦的作品在新时期以来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重视。关于他的研究论文、专著、作品收集和整理、回忆录、评论集、传记、年谱等学术工作不断取得积极的进展,这些工作是论文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反思和推进的起点。关于穆旦研究的整体基本情况,各个时期都有研究综述可以参看。^②

①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收入《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著,李秋零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② 代表性的研究综述包括:李怡:《穆旦研究评述》,载于《诗探索》,1996年第4期。陈林:《穆旦研究综述》,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易彬、李方:《穆旦研究十年》,(1996—2005)评述,载于《诗探索》,2006年第3期。

1. 穆旦(查良铮)的作品整理和编辑情况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穆旦诗歌的命运经历了耐人寻味的曲折过程。他的诗歌在40年代引起了广泛的称赞,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新时期之前则陷入了长期的沉寂,从新时期直到现在,穆旦诗歌一直是现代诗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穆旦从40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新中国成立后则将精力主要放在翻译上,其作品发表和收录情况可以参看本文所附“参考书目”穆旦作品部分。在1996到1997年间,也即穆旦逝世二十周年前后,先后有《穆旦诗全集》《蛇的诱惑》(诗文集)和《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纪念文集)出版。^①2006年,《穆旦诗文集》和《穆旦译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此前文集中遗漏的诗歌、文章和翻译,是现在穆旦研究最为基本和可靠的文集。^②其中《穆旦诗文集》第一卷为诗歌卷,第二卷为日记、书信和散文卷;《穆旦译文集》第一、二卷收录拜伦长诗《唐璜》,第三卷为拜伦和济慈诗选,第四卷为雪莱和布莱克诗选,第五卷为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第六、七卷为《普希金抒情诗选》,第八卷为丘特切夫和朗费罗诗选。有关穆旦的佚诗、佚文仍在不断地收集之中。年谱类穆旦研究专家易彬编写《穆旦年谱》。^③传记类已出版的有陈伯良的《穆旦传》。^④回忆录则有20世纪80年代为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而编辑出版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⑤,收录了回忆和评论文章20篇,既有穆旦同窗、友人的纪念文章,也有后辈学人的评论佳作,很具参考价值。

2. 研究的热点及其基本情况

a. 现代诗歌的语言艺术

新时期以来的穆旦研究从对于穆旦诗歌的认真解读开始。由于其作品

① 穆旦:《穆旦诗全集》(李方编),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穆旦:《蛇的诱惑》(曹元勇编),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杜运燮等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穆旦:《穆旦诗文集》(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穆旦:《穆旦译文集》(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易彬:《穆旦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 陈伯良:《穆旦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⑤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